

# 黄枬森：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王东

黄枬森不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终身学术成就奖获得者，而且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人学、文化四大研究领域，他都作出了开拓性的重要理论创新。他继承发展了北京大学李大钊、冯定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优秀传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积极探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学术带头人，积极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研究。他继承发扬我党的优秀学风、文风、作风，以哲学创新积极为国家开创新局面做铺路石子，以高尚品德师德，赢得学术界和北大师生的爱戴。

黄枬森 1921 年 11 月 29 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在曙光中学读书时，通过艾思奇《大众哲学》等途径，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1942 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 年转入西南联大哲学系，中间一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名校复校后，1947 年重新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48 年哲学本科毕业后做著名康德专家郑昕教授的研究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前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学习研究工作达 70 年之久。后来，他被评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2 年，北大哲学系建系 100 周年庆典时他获得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说他也是哲学家，是因为他曾师从于郑昕教授，在西方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与庄福龄等人一起，带头开创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霍霜霜 摄

这门新学科，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并担任会长，后来还先后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八卷本、一卷本，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吴玉章奖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黄枬森不仅是哲学史家，而且广泛深入研究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哲学问题，堪称自成一家的著名哲学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从 2001 年开始，他系统倡导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显著特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论和开源创新论。他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带领学术团队，

授不负众望，以顶天立地的精神风貌，旗帜鲜明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1978 年改革开放起点上，他带头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波助澜；198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他率先在国际上发表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基础的论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积极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以人为本”成为党执政理念奠定重要的哲学基础、理论基础。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他又在《哲学研究》、《北京大学》等刊物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系列论文；在世纪之交，他又带头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创新研究论著……

黄枬森先生学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因而，许多著名学者都赞誉他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学术界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面旗帜。

黄枬森先生堪称是孔子首倡的中国教师精神在当代的杰出代表：要求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接人待物，它的最大特点是“宽”，学术领域宽广；学术根底深厚；对待他人宽容。他的文风的特点是：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不说假话，力戒空谈。正是在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这一点上，他的道德文章继承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好的学风、党风、党风，

2011 年推出了系列性专著《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全书 4 部（三卷本），堪称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观点摘编

## 刘保全：新闻要注重真实感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写新闻固然要告之以事、晓之以理，但还得动之以情。正如中宣部在《关于贯彻十八大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文风》中指出的：“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真实感是联系事理的桥梁。清人袁枚说：“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一篇好的新闻作品，必须用新颖、生动、感人的事实来传播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

这种感人的事实，不但要能体现新闻事件本身的价值，更要抓住新闻事件中最能打动人的真情。因为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尽管有华丽的词句，也只能像塑料花一样，虽然艳丽夺目，却因毫无生机，不能像真花那样芳香扑鼻而自然动人，谁还会有耐心去读它呢？应该说，文以真情取胜，佳篇每自真情实感出，早已成千古定论。

摘自：《新闻爱好者》2013 年第 1 期

## 钱乘旦：中国学术应当有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我们对西方学术仍需要关注，抱虚心学习的态度，紧追学术前沿。但无论是学习借鉴还是交流对话，都意味着“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其实，西方学术中最值得赞赏的是它的独立思考与批评精神，有了批评才有创新，也才有活力。西方人在不断批判自己：康德批判、黑格尔批判、“科学理性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等等；通过批判前人，后人成就出新的理论和新的体系，如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凯恩斯批判国家放任主义，新的“主义”在批评中产生，西

方经济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设想哪一天，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例如“哈贝马斯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这样的作品，即便它显得幼稚，也是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到那时，中国就出现“大师”了。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从了。现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础上的分析与批判，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障碍。现在的中国学术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自信，中国学术应当构筑自己的话语了！

摘自：2013 年 2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黄鸣奋：屏幕文化具有“双刃剑”作用

正确看待屏幕，是媒体素养主题中应有之义。斯奈德主编的《从页面到屏幕：将文化教养带进电子时代》一书，就出于这样的考虑。屏幕既是现实的映射，又是现实的藩篱——人们既可能因屏幕而对现实理解更多，也可能因屏幕而距离现实更远。屏幕既是分割的屏障，又是对话的窗口——人们既可能因沉溺于屏幕而与身边人疏远，也可能因活跃于屏幕而与远方的人亲近。屏幕既是自由创造的平台，又是社会监视的工具——人们既可能在屏幕上

抒发自己的情思，又可能通过屏幕施加对他人的控制。屏幕既是艺术的窗口，又是实用的利器——它不仅改变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现实的功利关系（例如，无人机驾驶员通过屏幕操作而向敌方发起远程攻击）。屏幕既提醒社会热点、引发艺术关注，又制造现实假象、造成心理麻木——人们既可能因观看它而萌生更强烈的创作冲动，也可能因迷恋它而变得无所事事……凡此种种，再次显示了技术的“双刃剑”作用。

摘自：《学术月刊》2012 年第 7 期

杨晓华 摘编

# 电影中的古典音乐

聂乔

音乐当年给你带来的印象足够深刻的话，你可能会隐约记起当时的屋子里空气的味道，渐渐地，甚至是当时屋子里光线的明暗、温度，以及周边的一切感官记忆都会被慢慢唤醒。当这种记忆的味道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周身弥漫，或许你已经潸然泪下。

这种描述，有没有让你感受到，它是与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受很相似呢？而古典音乐与电影之间的渊源也远远不止这一点感慨而已。

何谓古典音乐？广义上是指诞生于中世纪至 19 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包括了巴洛克、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等不同时期的诸多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乐器编制的音乐。而我们现在狭义的古典音乐，担着探索和拓宽全人类感知力这样的重任。再比如，每次听到古典音乐抑或是谈到古典音乐，心底总会不由自主得将它与“经典”二字相联系，脑海泛起的阵阵波澜也总与自己曾经被“经典”打动的一段段回忆有关，而诸如此类的回忆也都深深地印上淡淡的怀旧味道。也就是说，在我们内心深处，此时的古典音乐已经不只是一首音乐本身，它更承载了我们个人对它的感知，以及产生这样那样的感知时周边的种种境遇。当我们听完一首音乐，关上唱片机的時候，这一切的一切，包括听觉与感知也同时都被打包封存在了我们的记忆里。这样的记忆比原本音乐本身来的更加珍贵与生动，是真正独一无二的独家记忆。那么，也许历经数年之后的某一天，当再次聆听同一段音乐的时候，曾经初次相见的震撼或许已经历过沉淀，变得不再娇嫩，却多了一份厚重，而这一份厚重的感受往往正来自音乐本身加上你的那份独家记忆。你可能会忘记当年是在哪间屋子，什么季节，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第一次聆听这首作品，但是如果这首

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代学术名师。他在 1983 年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96 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2001 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师德模范。

黄枬森教授在年近 90 之际，不考虑个人名利，没有安于颐养天年，而是上书中央，力陈大义，为实现 21 世纪中国梦，主张大大加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学科建设。他还不顾老迈之躯，主动请缨，带头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力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开掘哲学基础。

相关链接

黄枬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1 年生于四川，2013 年 1 月在北京逝世。黄枬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哲学体系创新、人学和文化四大研究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黄枬森始终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和建设者。他对列宁《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强调研究和评价，开创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先河，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方法和范式。他和庄福龄、林利任主编，历时 13 年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潮音阁

时下，某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已经不再是“鱼水关系”了，而是“油水关系”，甚至是“水火关系”。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干部与群众交流沟通不当应该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的干部作风漂浮，不切实际，不能入乡随俗，与群众谈话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很少能讲到群众的心坎上；有的干部到了基层，前呼后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甚至动辄训人，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有的干部满口华而不实的官话、漂亮空洞的套话，令人生厌，令人腻烦，令人痛恨。

多讲群众欢迎的话，一要善听，二要真心，三要熟悉，四要有用，五要精简。

善听，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在讲话之前，先听群众怎么说，怎么想。干部是为群众服务的，只有放下架子，从群众的立场、角度出发，先让群众讲讲话，党员干部再根据群众讲话有的放矢地发表意见，这样的讲话何愁群众不愿听？

真心，就是要真诚实在，贴心暖人。古语云：“为民立言，唯真为美”。那种漫无边际，海阔天空的讲话，尽管言辞激昂、滔滔不绝，结果仍会是无法抓住听众。干部讲话只有抱着对人民利益负责的态度，实实在在、情真意切，才能让听众感到真实可信，心悦诚服地去听、去学、去做。

熟悉，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讲群众听得懂的话。群众最喜欢用什么语言，我们就用什么语言。端架子，不客气，这样的干部群众不喜欢，这样的话群众不想听；而说“土话”则易于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密切感情，是打开群众心灵的“钥匙”。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大话”“套话”变成“土话”“实话”，用充满感情和乡土气息的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施教于民、取信于民，才能受到群众欢迎。

有用，就是要能指导基层、

# 多讲群众欢迎的话

袁浩

推进工作。如果讲话讲了一大堆，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是正确但没用的废话。领导干部讲有用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深入调查研究，摸实况，解民情，听民意。心里有了东西，知道了百姓的所想、所需、所盼，讲起话来才能有的放矢，把得准、放得开、讲到位；才能抓住本质，有思路、有观点、有措施。这样的讲话，群众才有兴趣听。

精简，就是要简洁有力，注重实效。孔子曾倡导“辞达而已矣”，实践证明，群众最怕听官话、套话、长话。一是一，二是二，人们听了才感到自在。干部讲话时间长短应视情况、视内容，注重从实际出发，从实效出发，该长则长，该重则重，坚持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想说明的道理，才能避免出现话语表达上的“失语”、陈旧和本本主义现象。

让我们更加体会到古典音乐的无可替代，像一种符号、一种味道，一种印记，深刻又沉稳地温暖了每一帧画面，感染着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如同母亲，或是一位睿智的老者，使人不知不觉敞开心扉，卸下防备，开启心灵如婴儿般敏感的感受力。它不同于其他同样也具有感染力的音乐，它没有新创作音乐所带来的全新听觉的感官刺激，却以不带攻击性的感染力，打出这张攻无不克的温情牌，可谓仁者无敌也丢盔。也许，这就是怀旧的力量。经过久远的沉淀，已经美得无需漂亮。

问题是，古典音乐的自律性决定了它就是纯粹凭借旋律和节奏等音乐元素相组合，需要经过听者在感官经历过程中加入联想和想象，唤醒内心感受，从而达到表现相关主题的目的。正所谓“声无哀乐”，音乐的情感并非客观存在于音乐中，而是主观存在于每位听众的情感记忆中。好的音乐，就是能瞬间找到并打开你心中封存那种记忆的那只箱子。换言之，不是音乐直接表现了某种感情、画面或场景，而是在听众构想的帮助下，在感官经历的过程中逐步构筑起来的。古典音乐更是一个完整的曲式，层层铺垫递进渲染直至曲终，从而表达一个完整的作曲家意图展现的精神内涵。这样看上去，古典音乐作为电影音乐时的非独立性，与它本身的自律性之间的确存在矛盾之处。

其实，不仅是古典音乐，电影本身与它的观众也存在某种潜在的矛盾，例如，我们看电影，明知是假象，却依然会感动，会沉浸其中。然而，这两种看似联系不大的矛盾之间又有什么潜在关系呢？让我们回到最初介绍那本书的结束语里找到一点点启发吧：

“回想一下坐在戏院里面的那个感觉，如果遇到一些场面你想想，你旁边都坐着人，你就这么

哭了出来，把你人性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公开在别人面前。虽然大家不会太留意你，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旁人存在的这种压力，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等于在交心，我们没有办法用遥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我们完全放弃了自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吗？这难道不是很像爱情吗？”

假如我们以开放、宽松、尊重的态度看待电影，看待电影音乐中的古典音乐与古典音乐本身，勇于腾出完整的一颗心用来像孩童般不加保留地接受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一切感受进入我们的身体。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内暂时忽略电影本身，忽略古典音乐本身承载的其他与电影无关的内涵，忽略我们先前已经固有的成见，或许这些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

只需要把古典音乐交给电影，就像爱情一样。不知道那些善用古典音乐作为电影配乐导演们是不是也赞同这样爱电影的态度？也不知道当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还有姜文这 3 位导演，不约而同地将马斯卡尼的独幕歌剧《乡村骑士》中的间奏曲，分别运用在自己的电影中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以这样爱电影的态度，将喜爱的古典音乐片段，作为一种可以唤醒回忆的温情符号，勇敢地把它交给了电影，仿佛他们自己的作品，使他们相识、相知、相恋、水乳交融，从而成就了那样不朽的爱恋。

当我喜欢的音乐出现在我同样也喜欢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时，我没有感觉到音乐夺走了我的注意力，只因音乐的渲染，更走近了孤单的人物，仿佛他们与我相识已久，仿佛同样走近我们共同的青春期的孤独与惆怅。而这些原来在音乐本身没有的内容，在它与中国电影交融的过程中，在我的脑海中诞生了。